

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

——兼议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

龚文娟 杨康**

摘要：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关键步骤的农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治理，高度依赖农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的提升。为了探析农村居民日常实践中的环境参与行为及其形成机制，本文尝试提出“社会信任-社区归属感-环境参与行为”解释框架，并利用在福建省长汀县开展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其一，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更多地参与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环境行为；其二，农村居民对乡贤能人信任与制度信任水平越高，其环境参与行为越积极；其三，社区归属感在农村居民社会信任与环境参与行为的关系中发挥部分正向中介作用。本文认为社区归属感的培养以及环境参与行为的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塑造，对于激发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居民 社会信任 环境参与行为 社区归属感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效应评价与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BSH082）的阶段性成果。

** 龚文娟，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治理；杨康，厦门大学党委统战部科员。

一 引言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为新时代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做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①、《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②等相关文件对农村环境治理提出了具体的要求。2021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③指出,到202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绿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④正式出台,不仅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宜居纳入乡村振兴建设的要求,同时明确了建立包含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为农户参与农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了法律支撑。

农村居民作为农村环境协同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和受益群体,其环境参与行为是农村环境治理能否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农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还有其特殊的制度背景和文化情境:首先,在制度设置方面,农村环境治理及居民环境参与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政策供给和法律法规支持相对欠缺;其次,“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中存在的乡俗民约,通过个人对声誉的关注,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66237.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7月25日。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7月25日。

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网,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02/t20210221_6361863.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7月25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4/8777a961929c4757935ed2826ba967fd.s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7月25日。

规制其环境行为;^①最后,随着城市化推进和村庄外出务工人员增加,村落中社会关系改变,人们的交往范围和生活方式变化,均对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和环境保护产生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地方知识、声誉诉求、信任、群体认同等社会因素,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愈加凸显其重要性。^{②③④⑤}

相较自上而下的管制型乡村环境治理,自下而上的参与型乡村环境治理在构建可持续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方面,更具实践意义。因此,如何结合地方特征,激励和引导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自主开展环境参与行为,构建依靠内在动力运行的农村治理体系,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⑥⑦}本文尝试提出“社会信任-社区归属感-环境参与行为”解释框架,探析农村居民日常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并以在福建省长汀县开展的调查为例进行实证检验。

二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 社会信任

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始于齐美尔对交换行为的研究,他认为离开

-
- ① 徐志刚、张炯、仇焕广:《声誉诉求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家禽养殖户污染物处理方式选择为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10期。
 - ② 何可、张俊飏、张露、吴雪莲:《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管理世界》2015年第5期。
 - ③ 颜廷武、何可、张俊飏:《社会资本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1期。
 - ④ 唐林、罗小锋、张俊飏:《社会监督、群体认同与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基于面子观念的中介和调节作用》,《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2期。
 - ⑤ 唐国建、王辰光:《回归生活:农村环境整治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实现路径——以陕西省Z镇5个村庄为例》,《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 ⑥ 史恒通、睢党臣、徐涛、赵敏娟:《生态价值认知对农民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以陕西省渭河流域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2期。
 - ⑦ 龚丽兰、郑永君:《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6期。

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 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 因为几乎很少有
什么关系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认知上。^① 信任作为一种信念, 体现
了个体在互动过程中对他人和社会所表现出的一种期待。^② 在巴伯看
来, 个体对社会和他人存在信任就是其对社会的发展和他人的行为存
在确定的预测, 而社会和他人也基本确实按照这一预期行动。^③ 对于
信任产生的条件, 福山的理解是, 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符合规范、富有
诚信且有合作意愿的社会群体中诞生, 信任的产生依靠人们共同遵守
社会的整体规则, 以及社会群体各个成员对社会的责任感、归属感的
提高。^④

学者们根据信任程度以及信任主体的不同, 对社会信任进行了分
类 (见表 1)。普特南、福山等人将社会信任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
任。特殊信任一般建立在宗族和亲情关系上, 普遍信任则没有固定对
象。^⑤ 卢曼将社会信任区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基于人际
关系建立, 制度信任则基于契约、规范而形成。^⑥ 吉登斯依据其后现代
性思想, 将社会信任划分为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⑦

信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人们通过建立对社会
系统的信任和依赖, 来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⑧ 信任有助于显著提
升公众的主观幸福感, 由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而产生的主观感受往

① 齐美尔:《货币哲学》, 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8 年。

② 尼克拉斯·卢曼:《信任》, 瞿铁鹏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

③ 伯纳德·巴伯:《信任的逻辑和局限》, 牟斌、李红、范瑞平译,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④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彭志华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 年。

⑤ 杨柳:《社会信任、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 年。

⑥ 尼克拉斯·卢曼:《信任》, 瞿铁鹏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

⑦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⑧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年。

往会推动社会行为的产生。^① 信任既可能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也可能借助其他要素,比如地方依恋、群体认同等主观类的认知和感受,对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② 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要建立可持续治理模式,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是一个重要关切点。

表 1 社会信任分类

信任类型	主要代表	主要特征
普遍信任	普特南、福山	一般无固定对象
特殊信任		一般建立于宗族、亲情关系上
人际信任	卢曼	一般基于人际关系建立
制度信任		一般基于契约、规范而形成
人格信任	吉登斯	对人的信任
系统信任		对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的信任

2. 环境参与行为

亲环境行为是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对环境有利的行为,具体表现为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采用绿色的生活方式等。^{③④} 本研究将环境参与行为定义为农村居民在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对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有益的行为以及在村庄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参与行为。

影响居民环境参与行为的因素包括内外两方面。内部因素包括居民的行为控制、规则认知、参与意愿等。外部因素则主要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亲密关系、朋辈压力等因素关联。研究发现:

- ① Helliwell J. F., “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nomic Modelling*, Vol. 20, No. 2, 2003, pp. 331 – 360.
- ② 王学婷、张俊飏、童庆蒙:《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4期。
- ③ Mykolas S. Poskus, “Investigat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Lithuanian University Students,” *Current Psychology*, Vol. 37, No. 1, 2018, pp. 225 – 233.
- ④ 彭远春:《试论我国公众环境行为及其培养》,《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公众的环境参与行为,存在性别、年龄等人口学方面的差异;^①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环境参与行为的动机、环境态度、环境责任感、环境价值观等对公众保护公共环境行为具有显著影响。^{②③}

3. 社会信任与环境参与行为的关系

社会信任水平提高会直接带动公众参与社区事务的可能性提升,如采取更为友好的生活和耕作方式,或积极参与农村环境的合作治理。^④同时,社会信任的提升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参与农村地区环境治理的意愿和积极性,转化为积极行动。^⑤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特征明显,特殊信任基于宗族、亲情关系,有研究发现农村地区的特殊信任水平较高,普遍信任水平相对低于特殊信任。^⑥但特殊信任对象的局限性,导致其对农村居民行为的影响受到削弱和抵消^⑦。普遍信任对农村居民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利于社区治理。^{⑧⑨}当前中国农村地区,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都有可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产生影响。

制度信任的建立基于契约和规范,在农村地区具体表现为对村委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制度信任通过确定的规则以及政府部门及人员的合法行为获取居民信任,因此往往更加稳定,为乡村法治

-
- ① 刘云霞:《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意识的影响实证研究》,《环境保护科学》2016年第3期。
- ② Feng W. and Reisner A., "Factors Influencing Private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s: Results from a Survey of Residents in Shaanxi,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 92, No. 3, 2011, pp. 429-436.
- ③ Barr S., "Factors Influencing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 U. K. Case Study of Household Waste Management," *Environment & Behavior*, Vol. 39, No. 4, 2007, pp. 435-473.
- ④ 张诚:《社会资本视域下乡村环境合作治理的挑战与应对》,《管理学刊》2020年第2期。
- ⑤ 赵艺华、周宏:《社会信任、奖惩政策能促进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吗?》,《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年第4期。
- ⑥ 李周强:《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 ⑦ 陈捷、卢春龙:《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 ⑧ 何可、张俊彪、张露、吴雪莲:《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管理世界》2015年第5期。
- ⑨ 杨柳、朱玉春、任洋:《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1期。

提供制度保障。制度信任对农村居民包括环境参与行为在内的社会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①②③}

在环境保护行为和环境风险沟通行为研究中,亦有学者发现社会信任的作用。龚文娟考察了系统信任与公众参与环境风险沟通行为的关系,指出公众对政府、市场、媒体/社团和专家等主体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同时,公众对系统的信任影响其风险应对行为。^④ Bohr 发现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公民提升环境和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认知。^⑤ 本文尝试基于一手调查数据,剖析农村居民不同维度的社会信任对其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提出如下假设:

H1: 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对其环境参与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即农村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环境参与行为水平越高。

4. 社区归属感对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

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居民对社区喜爱、依恋的程度。^⑥ 既往研究发现:社区归属感越高的农户,越会愿意且积极参与到社区环境治理当中。同时,农户参与行为的增加也会进一步增强其对社区的认同与关心。^⑦ 作为社区归属感重要维度的社区依恋,对农户的环境治理参与意

-
- ① 何可、张俊飏、张露、吴雪莲:《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管理世界》2015年第5期。
 - ② 蔡起华、朱玉春:《社会资本、收入差距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以三省区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维护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4期。
 - ③ 杨柳、朱玉春:《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基于黄河灌区五省数据的验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3期。
 - ④ 龚文娟:《环境风险沟通中的公众参与和系统信任》,《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 ⑤ Jeremiah Bohr, "Barriers to Environmental Sacrifice: The Interaction of Free Rider Fears with Education, Income, and Ideology," *Sociological Spectrum*, Vol. 34, No. 4, 2014, pp. 362-379.
 - ⑥ 汪雁、风笑天、朱玲怡:《三峡外迁移民的社区归属感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2期。
 - ⑦ 李芬妮、张俊飏、何可、畅华仪:《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1007个农户调研数据》,《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4期。

愿也有正向影响作用。^① 同样,在城市居民群体中,对社区的依恋能够促进社区居民对环境保护和社区环境治理给予更多关注,提供更多人力和物力支持。^② 社区归属感作为一种个体对社区情感上的认同、喜爱甚至依恋,来自个体长时期在社区中与其他行动主体的互动以及建立起的紧密联系和情感纽带。因此,社区归属感与社会信任程度紧密关联,后者很可能会通过前者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环境保护在内的诸多社区事务。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社区归属感在社区居民社会信任与环境参与行为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

(二) 分析框架

1. 研究思路

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反映了他们对家人、其他村民、乡贤、村干部、各级政府等主体的信任状况。依据文献梳理,本文认为:一方面,村民对其他行动者积极的信任态度和情感体验,会促使其对环境参与行为取得的结果给予正面评价,趋向于将环境参与行为视为符合农村居民行为规范的行为,且在环境参与过程中能够充分理解各级政府的政策和规定,并利用同村居民、家人、乡贤和各级政府等各方社会资源参与环境保护;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具备了一定的社会信任,农村居民对所居住的社区产生亲密感和归属感。为了提升和维护居住社区的优良环境,居民积极评价所居住的农村社区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范。具备

① 王学婷、张俊飏、童庆蒙:《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4期。

② Kyle G. T., Absher J. D. and Graefe A. 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lace Attach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itudes Toward Fees and Spending Preferences," *Lsurences*, Vol. 25, No. 1, 2003, pp. 33 - 50.

较强社区归属感的农村居民会正面期待自身环境参与行为是否符合社区规范,并愿意付诸实践,甚至会监督他人的参与行为。因此,本文提出“社会信任-社区归属感-环境参与行为”解释框架。

2. 分析策略

依据上述假设与思路,本文数据分析模型如下:

总效应模型:

$$Y = CX + e_1 \quad (1)$$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

$$M = aX + e_2 \quad (2)$$

中介效应模型:

$$Y = C'X + bM + \Sigma X + e_3 \quad (3)$$

其中, X 为自变量; Y 为因变量; C 为总效应, C' 为直接效应; M 为社区归属感(中介变量); a 为自变量对中介变量 M 的路径系数; b 是在控制了自变量 X 的影响后,中介变量 M 对因变量 Y 的效应; e_1 、 e_2 、 e_3 为残差。

通过实地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笔者获取了翔实的田野资料,后文笔者将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三 数据与变量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效应评价与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BSH082)团队于2020年8月及2021年1月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开展的田野调查。数据形式包括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选取长汀县及其下辖村庄作为田野点,主要是考虑到长汀县经历了长期的水土流失治理,并取得优秀的绿

色经济发展成果。

问卷调查采取多阶段混合抽样方法,选取了福建省长汀县的村庄开展。第一步,以水土流失治理效果为标准,抽取了长汀县 3 个乡镇;第二步,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1~2 个村庄;第三步,在每个村庄中随机抽取农户,每户调查 1 位村民。本次调查过程中,问卷采用现场填答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313 份,回收有效问卷 305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44%。

围绕主题,团队还开展了实地走访、座谈会、深入访谈等活动,其中座谈和访谈对象包括镇政府负责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成员等村干部、乡贤能人、合作社负责人、农村普通居民等,受访者均为长汀县本地人。

(二)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是农村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指农村居民在生产生活中参与的对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有益的行为以及在村庄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行为。本文通过 8 个题项测量农村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分别是“我在农业生产中会注意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量”、“我不会随意丢弃塑料膜等农业废弃物”、“我会将生产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我不会将家畜(鸡鸭、猪、羊等)粪便随意倾倒”、“我在生活中会注意节约用水用电”、“我会主动为改善村庄环境提出意见建议”、“我会主动参加社区组织的环境保护行动”和“我会为村庄环境改善提供资金、物品和劳动力支持”。利用李克特量表,每题答项为“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5 个等级,并赋值 1 分到 5 分。通过询问受访者环境参与行为与上述 8 个题项的符合程度,对其加总得到综合评分。

2. 自变量

本文自变量为社会信任。社会信任通过一定的对象和主体来实现,

人们希望建立公平的互动与合作空间,社会信任在其中表现为各主体之间对彼此行为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的期待。^① 本文将社会信任定义为农村居民对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信任,参与主体涉及其他村民、亲人、乡贤、各级政府、企业、农业合作社等。本文通过10个题项测量社会信任,分别是“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我的家人是可以信任的”、“我家的邻居是可以信任的”、“除邻居以外的同村村民是可以信任的”、“在村里的企业/合作社是可以信任的”、“村里的乡贤/能人是可以信任的”、“村委会干部是可以信任的”、“乡/镇政府是可以信任的”、“县政府是可以信任的”和“中央及省政府是可以信任的”。利用李克特量表,每题答项为“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5个等级,并分别赋值1分到5分,加总得到“社会信任”变量,分值越高代表受访者社会信任度越高。

3. 中介变量

社区归属感作为展现居民对社区依恋程度的变量,指社区居民居住于本社区时,表现出对社区中的人、社会关系、文化的认同以及将自身视为社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所表现出的荣誉、热爱等情感。^② 其评价标准已经比较成熟,本文通过4个题项测量农村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分别是“我在村庄有家的感觉”、“我喜欢我的村庄”、“我很自豪告诉别人我住在哪里”和“如果不得不搬走我会很不舍”。利用李克特量表,每题答项为“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5个等级,并分别赋值1分到5分,加总得到“社区归属感”变量,分值越高代表受访者的社区归属感越强。

4. 控制变量

既往研究已经证实人口特征及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农户行为的影

① 史宇鹏、李新荣:《公共资源与社会信任:以义务教育为例》,《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

② 汪雁、风笑天、朱玲怡:《三峡外迁移民的社区归属感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2期。

响。^① 因此, 本文将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设置为控制变量。其中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所在地, 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职业、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支出、家庭存款、主观收入水平评价和主观生活水平评价。变量说明见表 2。

表 2 变量说明

变量	赋值	说明	
人口学变量 (控制变量)	性别	0 = 男; 1 = 女	
	年龄	定距变量	
	受教育程度	0 ~ 7: 0 = 未受过教育; 1 = 小学; 2 = 初中; 3 = 中专; 4 = 高中; 5 = 大专; 6 = 本科; 7 = 研究生及以上	
	户口所在地	1. 本市城镇户口; 2. 本市农业户口; 3. 外地城镇户口; 4. 外地农业户口	
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控制变量)	职业	1 ~ 15: 1 = 机关/社团/事业单位领导; 2 = 机关/社团/事业单位普通职员; 3 = 企业管理人员; 4 = 企业普通员工; 5 = 私营企业主; 6 = 军人/警察/武警; 7 = 农林牧渔工作人员; 8 = 务工人员; 9 = 保姆/家庭服务人员; 10 = 离退休人员; 11 = 下岗/失业/待业人员; 12 = 学生; 13 = 家庭主妇; 14 = 个体户; 15 = 其他	
	家庭年收入	定距变量	
	家庭年支出	定距变量	
	家庭存款	定距变量	
	主观收入水平评价	1. 上等; 2. 中上等; 3. 中等; 4. 中下等; 5. 下等	赋值越大, 主观收入水平评价越高
	主观生活水平评价	1. 富裕; 2. 小康; 3. 温饱; 4. 贫困	赋值越大, 主观生活水平评价越高

① 唐林、罗小锋、张俊飏:《社会监督、群体认同与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 基于面子观念的中介和调节作用》,《中国农村观察》2019 年第 2 期。

续表

变量		赋值	说明
环境参与行为 (因变量)	8 个题项	1 分 = 完全不符合; 2 分 = 不太符合; 3 分 = 一般; 4 分 = 比较符合; 5 分 = 完全符合	分值越高, 环境参与行为越活跃
社会信任 (自变量)	10 个题项	1 分 = 完全不符合; 2 分 = 不太符合; 3 分 = 一般; 4 分 = 比较符合; 5 分 = 完全符合	分值越高, 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社区归属感 (中介变量)	4 个题项	1 分 = 完全不符合; 2 分 = 不太符合; 3 分 = 一般; 4 分 = 比较符合; 5 分 = 完全符合	分值越高, 社区归属感越强

四 分析与发现

(一) 农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

表 3 呈现了本研究中受访者的环境参与行为情况。从整体得分情况来看, 受访者的环境参与行为得分均值为 31.91 分, 最大值为 40 分, 最小值为 23 分。总体而言, 受访者的环境参与行为状况良好。

通过对环境参与行为不同维度的分析, 本文发现, 农村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存在差异。农业生产中的环境参与行为和节约用水用电行为的得分, 显著高于村庄公共领域中环境参与行为的得分。注意生产中控制农药的使用、不会将家畜(鸡鸭、猪、羊等)粪便随意倾倒以及注意节约用水用电都符合受访者的切身利益。而主动参加社区组织的环保活动、为社区环境卫生改善提供资金、物品和劳动力支持以及主动为改善村庄环境提出意见建议等行动, 相对而言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 同时转换成现实利益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因此村民在村庄公共领域的环境参与行为得分相对偏低。这一发现与多轮 CGSS 调查的结果一致。

表 3 农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

单位: 分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环境参与行为	23	40	31.91	2.946
我在农业生产中会注意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量	1	5	4.02	0.693
我不会随意丢弃塑料膜等农业废弃物	2	5	4.37	0.564
我会将生产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	1	5	3.40	0.841
我不会将家畜(鸡鸭、猪、羊等)粪便随意倾倒	1	5	4.33	0.680
我在生活中会注意节约用水用电	1	5	4.78	0.522
我会主动为改善村庄环境提出意见建议	1	5	3.30	0.865
我会主动参加社区组织的环境保护行动	1	5	3.82	0.747
我会为村庄环境改善提供资金、物品和劳动力支持	1	5	3.83	0.763

(二) 农村居民社会信任状况

表 4 呈现了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情况。样本中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得分均值为 40.08 分, 其中最小值为 22 分, 最大值为 50 分。总体而言, 受访者的社会信任水平较高。

表 4 农村居民社会信任状况

单位: 分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社会信任	22	50	40.08	4.109
对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信任	1	5	3.78	0.708
对家人的信任	2	5	4.93	0.316
对邻居的信任	2	5	3.94	0.550
对除邻居外的同村村民的信任	1	5	3.38	0.659
对村庄企业/合作社的信任	1	5	3.41	0.579
对乡贤/能人的信任	1	5	3.60	0.610
对村委会干部的信任	1	5	3.89	0.747
对乡/镇政府的信任	1	5	4.07	0.785

续表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对县政府的信任	1	5	4.34	0.766
对中央及省政府的信任	1	5	4.74	0.599

通过对社会信任不同维度的分析，本文发现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针对不同对象存在差异。受访者人际信任水平基本上呈现随亲密程度的下降而下降的趋势，其对家人的信任得分均值显著高于对邻居及同村村民的信任，而其对除邻居外的同村村民的信任水平为 3.38 分，显著低于其他人际信任的维度。同时，可以发现受访者对各级政府的信任水平较高，这与过往研究关于村民对地方政府信任偏低的发现不一致，但符合政府信任呈差序分布的发现，即随着政府层级的提升，受访者的信任得分逐渐提高。长汀县是生态治理示范县，在这里，村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们对环境治理规范的认可与执行。

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之前，本文先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进行了因子分析（见表 5）。通过对社会信任量表进行巴特利球形检验（ $p < 0.001$ ）、KMO 检验（ $0.807 > 0.700$ ）以及信度分析（克朗巴哈系数 = $0.834 > 0.700$ ），本次调查得到的结果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和最大方差法旋转后，一共抽取了三个公因子。其中第一个公因子包括“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我的家人是可以信任的”“我家的邻居是可以信任的”“除邻居以外的同村村民是可以信任的”，本文将其命名为“人际信任因子”；第二个公因子包括“在村里的企业/合作社是可以信任的”“村里的乡贤/能人是可以信任的”，本文将其命名为“能人信任因子”；第三个公因子包括“村委会干部是可以信任的”“乡/镇政府是可以信任的”“县政府是可以信任的”“中央及省政府是可以信任的”，本文将其命名为“制度信任因子”。三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5.944%。

表 5 农村居民社会信任各维度因子分析

项目	人际信任因子	能人信任因子	制度信任因子
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	0.698	0.203	0.102
我的家人是可以信任的	0.615	-0.339	0.246
我家的邻居是可以信任的	0.773	0.153	0.107
除邻居以外的同村村民是可以信任的	0.662	0.392	0.159
在村里的企业/合作社是可以信任的	0.140	0.856	0.109
村里的乡贤/能人是可以信任的	0.195	0.647	0.376
村委会干部是可以信任的	0.226	0.386	0.666
乡/镇政府是可以信任的	0.093	0.187	0.857
县政府是可以信任的	0.143	0.120	0.881
中央及省政府是可以信任的	0.164	0.011	0.795
特征值	1.410	1.143	4.042
方差贡献率	14.099%	11.427%	40.418%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三) 社会信任与环境参与行为关系

为了便于考察居民社会信任与环境参与行为的关系，本文将社会信任因子值转换为 1 分到 100 分的得分，^① 将环境参与行为和因子分析得出的社会信任的三个维度分别作为因变量与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同时依据研究设计，将中介变量社区归属感以及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纳入模型中（见表 6）。本文对变量进行了共线性诊断，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小于 5，即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表 6 模型 1 至模型 3，随着不同变量的加入，模型调整 R^2 逐渐提高。

模型 2 显示，能人信任与制度信任对环境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显

^① 转换公式：转换后的因子值 = (因子值 + B) * A，其中 A = 99 / (因子最大值 - 因子最小值)，B = (1/A) - 因子最小值。该公式的使用参见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 年第 2 期。

著，即农村居民对乡贤能人和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其环境参与行为越积极。人际信任对环境参与行为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人际信任考察的是村民对于与其有亲密关系或具有相同特征的村民群体的信任，而亲密关系群体在个体客观特征及主观认知上与受访村民差异较小，趋同化的主观体验对受访者的环境参与行为产生积极推动的作用有限。因此，假设 H1 得到部分验证。模型 3 中加入社区归属感变量后，能人信任和制度信任对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降低，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参与行为，说明信任对环境参与行为的作用部分通过社区归属感实现。

表 6 农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0.089 *	0.044	-0.048	0.040	-0.029	0.039
年龄	0.006 **	0.002	0.003	0.002	0.002	0.002
受教育程度	0.049 *	0.023	0.037	0.021	0.028	0.021
户口所在地	-0.071	0.057	-0.039	0.052	-0.011	0.051
家庭年收入	0.242 *	0.097	0.198 *	0.089	0.166	0.086
人际信任			0.085	0.057	0.093	0.056
能人信任			0.289 **	0.091	0.243 **	0.089
制度信任			0.153 ***	0.039	0.125 **	0.038
社区归属感					0.193 ***	0.045
<i>N</i>	305		305		305	
调整 <i>R</i> ²	0.052		0.215		0.262	
<i>F</i> 检验值	4.074		10.628		12.07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注：模型中的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

村民 A 是其所在村的一位环卫工人，负责所在行政村 4 个自然村的环卫工作，其对村民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与评价较高。他认为近年来由于政府和村委会干部的积极作为，村容村貌发生了积极变化，他做保

洁工作的收入增加了,村民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你看这条沥青路,我每天都要扫的,不让路面上有垃圾和树叶,村里人出来走路看着就舒服了。大家开心,我也开心。路上他们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我扫得很干净。扫地也没什么技术要求,就是要慢慢来,你认真一点,什么路都能扫干净。这个沥青路是村里向县政府争取来的,花了很多钱的,打扫干净一点,我自己心里也舒坦。马路边墙上有壁画,每一户都有,他们院子里也都是很干净的,我要是大路没扫干净,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笑)。(202101CN02)

农村居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以及对村委会干部、镇政府的信任,激发其对村庄治理规范/规则的认同,促进他们的环境参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对其环境参与行为具有的影响在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即制度信任与能人信任对环境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过往研究的结论相吻合,即人际信任尤其是对亲人、朋友的特殊信任往往不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甚至由于此类信任关系的封闭性与内向性而对农村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产生消极影响。

(四) 社区归属感对村民社会信任与环境参与行为的中介作用

为了更细致地探究社会信任对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使用简单中介模型 Bootstrap 检验方法对社区归属感进行了中介模型检验。将自变量社会信任、因变量环境参与行为、中介变量社区归属感纳入模型,样本量选择 5000,在 95% 的置信区间下,结果如表 7 所示。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上限 = 0.189,下限 = 0.450),效应值为 0.319。而在控制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后,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对其环境参与行为的直接正向影

响仍显著（上限 = 0.250，下限 = 0.449），效应值为 0.350。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通过社区归属感的中介路径对其环境参与行为也具有显著的间接正向作用（上限 = 0.029，下限 = 0.118），效应值为 0.070。

表 7 中介模型检验 (N = 283)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效应类型	效应值	标准误	上限	下限
环境参与行为	社会信任	直接效应	0.350	0.051	0.250	0.449
		间接效应	0.070	0.023	0.029	0.118
环境参与行为	社区归属感	直接效应	0.219	0.044	0.133	0.305
社区归属感	社会信任	直接效应	0.319	0.066	0.189	0.450

同时，本文发现社区归属感仅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对其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的作用，如人们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通过影响个体的行为信念、规范信念而间接影响其实际行为。限于文章篇幅，本文未详细论述。社区归属感作为一种规范信念，可能与自我效能感、行动意愿等行为信念和控制信念一起在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H2 得到部分验证。

实地调查中获得的访谈资料也佐证了上述结论。村民 B 是 N 村的一位草莓种植户，其草莓大棚离村庄主干道以及河道都很近。除了照看草莓园的生意，村民 B 在空闲时间会主动参与河道与道路保洁工作。他认为 N 村发生大的改变，跟政府和村两委的积极作为有很大关系。

我们村以前是长汀远近闻名的穷村，外村姑娘都不愿意嫁到这里来。从我们村开始治理水土流失以后，从省里的领导到县里还有镇上的领导，包括我们村的书记，都给我们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所以我们村的人一直很支持村里的工作，以前建村委大楼，我们村民把自己家宅基地无偿捐了出来。后来村里建灌溉水渠，村民们也都是出了很大力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了村子好的。最近几

年我们村的环境啊、房子啊都弄得很好,每家每户生活也好,大家也都是希望村里环境好一点的。我这草莓园离村里的河跟马路都很近,村容村貌搞好了,来采摘的游客也多了,生意自然好。我们自己也很愿意把村里的环境搞好。(202101CN03)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受农村居民主客观条件约束的认知,对社区归属感具有正向影响,社区归属感又对农村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证明了“社会信任-社区归属感-环境参与行为”影响机制的存在。这一机制的验证为今后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激发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即可以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和社区归属感激发其环境参与行为的积极性。农村居民的自我效能感、获得感、幸福感等主观态度也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等观念的具象化表现,未来研究应考虑纳入上述要素,拓展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五 结论与讨论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激励和引导农村居民积极主动参与环境保护和治理,是未来环境政策需重视的面向。本文提出“社会信任-社区归属感-环境参与行为”解释框架,并利用福建省长汀县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以及访谈资料,检验了作为重要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中的能人信任与制度信任正向影响其环境参与行为,即能人信任与制度信任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越积极;第二,社区归属感在农村居民社会信任与环境参与行为的关系中发挥部分正向中介作用。

20 世纪中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面对法国社会快速城市化以及由此流行的消费主义,本着批判的精神,列斐伏尔提出了著名

的“社会空间理论”。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既不是一个‘主体’，也不是一个‘客体’，空间是一个社会现实，是一组关系和形态”^①。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是“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再现性空间”的三位一体。其中空间实践即对物质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实在的，可以被感知的；空间表象则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下的秩序密切联系，是人们通过符号和概念构造出的空间，是使用者与社会环境联系的纽带，也塑造着人们的行动以及对空间的再生产；而再现性空间则是基于前两者而提出的，是空间实践、空间表象的辩证结合。^② 苏贾在列斐伏尔的研究基础上，将空间划分为物质空间（对应空间实践）、精神空间（对应空间表象）和生活/社会空间（对应再现性空间）。^③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单单是物质空间的改造，也是居民思维空间、精神空间的塑造，更是情感连接、社会关系的编织。在乡村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农村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受到村貌改造、庭院整治、社会信任、廉耻心/荣誉感、邻里监督与示范效应、地方习俗、社区归属感等多元因素的影响，而村民的环境参与行为直接影响乡村环境治理的效果。

本研究在农村居民的个体情感连接和社会关系层面为实现农村环境有效治理提供了新启示。乡村振兴与农村环境治理不仅是对农村社区自然环境、人居环境的改造，也是对农村当前社会关系变化的思考，以及对农村居民社会认知的充分了解和改造提升。在政策设计层面，一方面要完善农村环境治理相关管理办法和物理空间；另一方面，需要依据与农村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空间和认知空间，制定激励政策激发农户环境参与的积极性。具体做法可包括：其一，发挥以乡贤为代表的乡村能人的作用，通过带动村民提升创业创收能力的同时，凝聚村民

①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1, p. 116.

② 刘少杰主编《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评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③ 苏贾：《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的地方的旅程》，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对乡村能人的信任,提升其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事务的意愿与能力;其二,通过规范各级政府及工作人员在环境治理中的行为,强化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资金、技术支持,巩固村民对各级政府及工作人员的信任水平,提升其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其三,通过邻里示范/监督、村邻“红黑榜”及“最美乡村人”等做法,激发村民的荣辱感及对农村社区的归属感和群体认同,提升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ernance. Research found that it is of great value of rural culture in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ut the moder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alway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governmental leadership and rural development. When the local governments take the lead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y respect and make use of rural culture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rural development. Farmers' sense of identity with local governments is deepening, and the phenomenon of farmers' government identity appears. This type of government-l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ll be the basic trend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need to respond positively in academic research to realize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ural Culture; Rur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al Identity;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Social Trust and Rural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Also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mmunity Belonging

Gong Wenjuan Yang Kang / 169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s a key step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nvironment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in rural residents' daily practice, this paper tries to propose a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social trust-community belonging-environment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uses the survey data carried out in ChangTing County, Fujian Province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test.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rural resi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tha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ir vital interests in their daily life; Secondl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trust in able persons and

institutions, the more active of their environment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Thirdly, community belonging plays a partially positive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sidents' social trust and environmental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belonging and the shaping of social space and spiritual space of environmental particip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rural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ec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Keywords: Rural Residents; Social Trust; Environment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Community Belong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Slump and Silt Changes and Respons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 Fengxian Coastal Zone Sinc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u Junfan / 191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nd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agricultural and salt industry as the center, and makes a diachronic rest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of slump and silt and the response mechanism of human activities in Fengxian coastal zone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re are interlocking effects among a series of natur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the rise and fall of sea level, tidal flat collapse, river congestion,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griculture and salt industry.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climate was warm and the sea level was rising, which was also the period when the tide invaded the coastal zone of Fengxian seriously and the coast collapsed. People built solid seawalls and dams to block the intrusion of salt tides, which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resh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side the seawalls; but outside the seawalls, due to the lack of sufficient fresh water and stable tidal flats, it was difficult to carry out agriculture, and the